



# 沉思集

倪艮山 著



# 沉思集

倪艮山著

天马出版有限公司

翻  
印  
必  
究



版  
權  
所  
有

## 沉 思 集

倪 艮 山 著

出版发行：天马出版有限公司  
地 址：香港上水新成路123号3楼  
电 话：00852-26706633  
传 真：00852-26701382  
印 刷：晨光印刷厂印制  
开 本：850×1168毫米 1/32  
字 数：220千字  
印 张：10.1印张  
印 数：0-3500册  
版 次：2005年8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定 价：港币 19.80元  
人民币 19.80元

ISBN 962-450-322-2/D.49003

◀ 2001年1月倪艮山在泰国  
曼谷湄南河畔



▶ 2004年9月倪艮山与爱妻  
谭淑云在江苏扬州瘦西湖五亭桥



▶ 2001年5月倪艮山在法国  
巴黎凯旋门



▶ 2001年4月倪良山在意大利  
威尼斯海港船上



▶ 1988年倪良山与爱妻谭淑云  
在京东燕郊家中



▶ 1988年夏作者与妹（家巽）、  
弟（铁山）在辽宁新宾家乡祖居  
故地留影



◀ 2001年5月倪良山在  
卢森堡大峡谷



▶ 2004年9月倪良山和爱妻  
谭淑云在浙江普陀山东海边



▶ 2001年4月倪良山在瑞士  
日内瓦湖畔





▲ 1935年夏 倪艮山与父母、妹妹在天津中山公园留影



▲ 1962年4月倪艮山和谭淑云  
在辽宁阜新结婚时留影



▲ 1954年1月  
倪艮山在北京  
(在肃反运动之前)

## 序言一

邹燕祥

读倪艮山先生书稿，其中回忆生平的部分，所述上世纪五十年代至七十年代以来的政治运动、各种事件，都是我同样亲历的，涉及的一些人，一些旧地，有些也是我熟悉的，读着尤感亲切。它足以唤醒我的记忆，并促使我睁大眼睛凝视我们记忆攸关的历史。

对于人生经历不相同的人，比如更年轻的一两代人，这本书，或类似的书，还有没有一读的价值呢？

如果有，那就是可供对一段历史“补课”的参考。一位很有识见的画家陈丹青先生，最近在鲁迅纪念馆的讲话中就说：“我们的历史教育是严重失实的，我们的历史记忆是缺乏质感的；历史的某一面被夸张变形，历史的另一面却给隐藏起来。”

民间的、个体的回忆，可以给历史言说注入真实，注入细节，也就注入了质感，有助于还原历史的本相。

人，社会的人，是离不开历史的。想要离开历史的人，也如想要拔着自己的头发离开地球一样，是徒劳的。时间无始无终，而我们生活其中的现实，是从历史而来，并将归于历史，只是历史长河中的一段。如果说先秦距今两几千年，已经是遥远复遥远的过去了，然而，先秦的思想，无论是孔孟或老庄的，不是依然影响着我们的人生观、世界观或最世俗的“处世哲学”吗？历史有它的光明面，也有它的阴暗面。主流意识形态不论是前些年的崇法，还是近些年的崇儒，不都是要我们回归传统的“阳光”下



吗？而在制度文化层面，“百代犹存秦政制”，能说我们已经完全摆脱了“千古一帝”大一统中央集权王纲独断传统的阴影了吗？那末，我们又怎么能够置身于百多年来近现代史的影响之外呢？只是对复杂的历史现象，有各种不同的判断和说法罢了。

历史是千百万人在一定的经济政治条件下互动的过程，在形成这一合力的各种力量对比中，强势群体的利益和意志虽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决定历史在一个时期的走向，然而，强弱会有转化，即使是占强势的群体及其代表人物，也仍然受到客观的局限——生产发展、认识能力以及利权分配的局限，而不能百分之百地逞其私愿。

这个历史过程能不能真实地反映在历代以文字记录的史书中呢？

中国自古以来一直推崇春秋笔法、赞美董狐的史德，由此可知，“左记言，右记史”而真要秉笔直书，有多大的阻力和难度。在改朝换代的不断更迭中，往往新朝修旧史，于前朝的弊政也许可少顾虑，但一旦遇到与当代统治集团有关连处，怕还是要受权力干预的。权力的本性，就是不断膨胀，要君临一切，何况是不受制衡的君权呢。于是，要求“信史”，确是戛戛乎其难矣。

历代的史官，是吃皇粮、享俸禄的，这样，笔下就难逃权力的羁绊。幸亏历代于官修的正史之外，还有甘冒斧钺的私家治史，以及从文字狱的网眼里漏出的野史笔记，哪怕其中夹杂着道听途说，但也差胜于有意制造的欺人之谈了。

我国政府在对待国际历史问题时，多年来强调“前事不忘，后事之师”，是完全正确的。这句成语，其实也只是对各国朝野那些有心汲取历史教训、总结历史经验的人有用；而对怙恶不悛的军国主义者之流，则是对牛弹琴。东瀛一再上演的“教科书事件”

就是一例。

所谓前事不忘，后事之师，所以具有普遍意义，就是它不但求诸人，也要反求诸己。我写过一篇小文，谈“我们也有教科书问题”，就是这个意思。在盛行“为尊者讳，为贤者讳，为亲者讳”的道德律令几乎视为当然的国度，提醒这一点非常必要。辛亥革命将近百年了，对孙（文）黄（兴）关系、“陈炯明兵变”等历史话题，才有人试探提起；民初至今八九十年了，对于当时一些历史人物的真实表现，才有一些摆脱漫画化或标签化的披露。所以如此，就是因为多年来许多档案成为秘籍，而公开的历史书写遮蔽了真相。

民国初年的社会政治，今天在世的前辈中，即使高龄如“五四”前出生的季羨林、黄苗子先生等已不及见；他们，以及上世纪二十、三十年代出生的知识分子，亲历了共和国时期的例如肃反、反右派、文革等愈演愈烈的政治运动，至今也又有四五十年了。这一段影响及于全民族的重要历史，在集体记忆和历史书中的情况，却很难令人满意。

在运动中，由于所处社会政治地位不同，也由于对历史、对人民（有些中共干部，则还有对党）的责任感不同，不但当时，而且嗣后对待这段历史的态度，也很不一样，甚至大相逕庭。

这里，矛盾集中于记忆抑或忘却之争，求实或掩盖之争。

在一般群众，不是深受其害的人，往往不自觉地淡化了记忆，一部分当时只求自保而基本上处于旁观者地位的人，如肃反时的非审查对象，反右中的中间派，文革中的逍遥派，虽然当时也有过一些紧张以至惊惧，但既得逃避和远离，往往也不愿再以回顾和反思“自苦”，这是人情之常。我认识一位六十多岁的资深编辑，他曾投入文革，但反右时还不在于场，后来虽也编发过反右背景的

作品，但于细节不甚了了，他听人说起反右时各单位都有划右派的控制数字（一般为单位人员 5% 的指标），竟大为惊异；另外一位作家是在北京大学经历反右派斗争的，而他对这个当时几乎人人知情的规定，竟也漠然不知，原来他正沉浸在热恋之中，于是“事不关己，高高挂起”了。

历次运动中的斗争对象，一般年事已高，有些人觉得人生一世，要活得明白，虽时过境迁，还在力图通过阅读和追问，探求历史真相，也就是在时代和环境的大小背景下，寻找众多个案共同的和个别的根源，并认识只有这样，才能够有利于后代，也才能够得心之所安。不过，也有一部分受害者采取了不再回首的态度，因为感到回忆使人痛苦，不如出离记忆。

出生于四五十年代的人，除了知青一代对文革和上山下乡保存了切身的记忆，而于早年的反右派斗争（更不用说更早的事情），往往也很隔膜，如听白头宫女说天宝年间事。

现在，生于六七十年代的作家，有些已开始“怀旧”了。在他们提到父辈的生活时，包括有些反映五六十年代的影剧中，可以发现，他们对土地改革、三反五反、镇反、肃反、反右、文革、干校、劳改、劳教这些关键词的理解，其中时序的先后，具体的区别，往往模糊不清。这不怪他们（当然他们也有不够严谨的一份责任），而首先是在公开出版物中，亲身经历那个历史阶段的过来人，写得不少了，无论是非文学的，还是文学的。过来人的记忆，有的已不可靠，何况是耳食之言，以讹传讹，这是就历史叙述的真实性而言；至于艺术的虚构，对于非虚构情景的想像，本来也是脱离不了原初的生活真实这个基础的。

看来，在一个相当长的时间内，封杀记忆以至消灭记忆的习惯势力还是颇为成功的。有一位在肃反（由反胡风引起）和反右

两大运动中受到迫害的朋友，他的孩子成长于八九十年代，毕业于名校，出国定居，高职高薪，竟因父母保存受迫害的回忆而反唇申斥，有甚于村民们的冷漠祥林嫂。因为他所受的教育中，共和国最初三十年的历史是一片空白。在一九七八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前，还在台上的某些文革掌权者，不但不许“为文革翻案”，对历次政治运动制造的冤案，照旧是连说也不许说的。三中全会打破了“两个凡是”的禁锢，为一九七六年的“天安门事件”平反，同时还平反了大量冤假错案。但其后不久就有了与中共中央声明“彻底否定文革”相悖的一些具体规定，成文的和不成文的，把文革和反右等划为公开言说的禁区。与此相应，有那么一些身居美国而拼命歌颂文革等极左行径的某派人士的文章、言论，对不知历史的年轻人——像刚才说的那个孩子，就乘虚而入了。

随着岁月的流逝，自然规律不断将历次政治运动的亲历者引出尘世。能为那个时代作证的证人只能是越来越少。我们现在看到，南京大屠杀和各地日军烧杀淫掠暴行（包括被抓劳工和慰安妇血泪史）的受害者、目击者、知情者，能作为证人出庭的已经屈指可数了。有鉴于此，我们更要与时间争夺历史的证人和证词。写出自己所经历的，耳闻目睹的历史真实，使我们对过去时期的历史有一个尽可能全面、尽可能真实的记录，当然应包括大家公认为国难和国耻的一切，这不是一般的怀旧，也不是如过去所谓之“忆苦”，而是一代人、两代人对子孙后人做出的必要的交代。每一个个人的记忆，汇集为群体的、社会的记忆，从而使我们这个历史悠久的民族的真实记忆，光荣和梦想，连同天灾与人祸，血泪的教训，在一代一代人心中接续下去，永志不忘。

在目下的法律实践中，遭遇到一个难办的环节，就是不易找到证人，或者证人找到了，却不愿出庭作证。大家明白，这是害

怕作恶者和违法犯罪者及其同伙的打击报复。但因此形成的证人缺席，难免成为罪犯逃避罪责的漏洞。而我们今天，以一个相当长的历史时期的过来人身份，以历次政治运动的亲历者、受害者的身份作证，阻力究竟来自何方，这是值得所有的人，包括明达的执事者好好想一想的。因为，这不是为了追究法律责任，而是总结历史经验。三十年乃至更长时间的正反面经验，如此之多，如此之深，有些且是浸透国人鲜血的，若不从思想上、制度上加以总结，历史的灾难完全可能以不同的形式重演。我想，这并不是危言耸听。中国从五十年代以来，一次又一次逆自然规律而动，以“向地球进军”和“征服自然”的名义对国土资源、环境生态、自然景观肆无忌惮地掠夺、摧毁、破坏，即使进入“新时期”后有所察觉，但总结经验不够认真，纠正措施更远不得力，有些方面甚至在更大规模上重复过去的错误，现在，自然灾害频仍，自然对人的报复已经临头，这是有目共睹的事实。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上是如此，而在社会政治生活方面，如不切实对待历史，所可能造成的灾难性后果，难道竟会有例外的侥幸吗？

因此，尽管倪昆山先生与我素昧平生，但他囑序于我，我也有话要说，就借此写了这样一些拉杂的感想。每个人经历有不同，才具有大小，记忆有详略，文笔有高低，但我们作为一个从二十世纪幸存下来的中国人，如果多少留下一段时代的证词，就不虚此一生，对得起自己有过迷惘与追求，也对得起自己受的那份苦难，对得起自己的良心，在面临“最后的审判”时，我们可以说：我说了一切，我拯救了我的灵魂！

2005年7月19日

## 序言二

和风鸣

我的蒙古族朋友艮山兄的文集即将出版，这是可喜可贺的大事，特意写上些话。

我和艮山兄是难友。我们的结识，缘起于2003年元月初兄长的来信。我有本自述性报告文学出版，书名：《经历——我的1957年》。兄长的来信，一开头就说到了这本书：“我是《经历》的读者，1949年毕业于燕京大学，先后从事计划与科研工作，1987年离休。由于我的中青年时代迭遭坎坷，肃反受审查；1957年划右，流放北大荒；‘文革’又蹲过牛棚。备历坎坷，是那个苦难年代的幸存者。读了您的大作，我曾多次潸然落泪。内心受到剧烈震颤。我深深理解您的不幸经历，我为大西北那些遇难的知识分子精英而无比悲愤。通过《经历》这部惊世骇俗、发聋振聩的巨著，使人们更深刻地认识到，当年在大西北发生的种种法西斯暴行，是我们民族、国家的耻辱；而那个苦难年代是我中华五千年历史乃至全人类历史上极为黑暗的年代。是令人发指而不可思议的。”

读了这封信，我很是感动。兄长1949年就毕业于燕京大学，肯定学识渊博，而他竟也迭遭坎坷，共同的经历，使他在读《经历》时多次潸然落泪。真是，同为天涯沦落人啊！

我立即为他复信。此后，我将自己的境遇，所思所想，在干些什么，行踪等等，在鸿书往来中，都坦诚地告诉他。他的来信坦诚而亲切。以后还不断把他发表在刊物上的许多作品复印后寄给我，使我对他有了更全面更深入的了解。我对他备增敬意，同

时，对他迭遭坎坷的经历深切同情，认为是绝不该发生的事。

此次，艮山兄出版的文集，从文体上说，有散文、杂感、政论、游记、小说等等，一位多年从事计划和科研工作的人，能够娴熟地掌握这种种的文体进行写作，是多么难得啊，他真是多才多艺，我很是敬佩。

我最喜欢兄长的几篇游记，有：《难忘的“海上璇宫”》、《西欧八国印象记》、《莱茵河上沉思录》、《登埃菲尔铁塔》等，几次出游，都是在平反后才出现的机遇。他的游记文笔优美、状景抒情，都能入神出化，一般的专业作家不过如此。令人耳目一新的，是每篇游记都注入了他独特的感受，写出了他特立独行的见地。在《难忘的“海上璇宫”》一文中，他曾“卷入欢乐漩涡与人们共舞，仿佛自己又重返青年时代，捕捉到了飘逝的依稀旧梦。一旦坐下来，特别是泰国小姐给予尊礼盛情时，我蓦然意识到，自己已是年逾古稀的高龄游客，如同飘落花丛的一枚黄叶罢了。现实的幸福是属于正在狂舞的泰国小姐和中青年游客的。我的青年踪影呢？飘忽的闪念，穿越岁月隧道与历史风雨。于是眼帘仿佛重现出当年噩梦：狂飙呼啸，浊浪翻滚、蒙冤受辱、批斗、挂牌游街、抄家、流放、蹲牛棚、遭受棍棒皮鞭的酷刑……从遍地荆棘中滚爬二十多年。虽然幸存下来，但是身心伤痕累累。学生时代的理想与追求，全部付之东流。”在享受“海上璇宫”的愉悦中，大半生辛酸苦难的一幕幕不能自己地又出现在他眼前，这身心的伤痛太深重，在任何时候也是拂之不去、淡化不了的，作为难友，我很能体会他的这种情感在游记中将其真实地加以描述，颇具特色。

《莱茵河上沉思录》，先是说到一位20多岁旅德汉裔大学生作导游，和他说过的一番话，这位年轻导游说：“在波恩，知识分

子密集。每到傍晚，酒吧、咖啡屋、餐馆、广场等处，常有市民、学生、甚至教授，三三两两聚在一起。自由交谈，辩论有关当年为什么会出法西斯，纳粹给社会留下什么危害等一类问题。不像我们对‘文化大革命’讳莫如深，把责任往‘四人帮’身上一推拉倒；甚至连巴老提出建立‘文化大革命博物馆’的倡议也没了下文……”这番话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后面写到，“最难能可贵的是，日耳曼人能以史为鉴：一不怕丑，二不怕疼；敢于正视历史，揭自身疮痍；深刻反思，由衷忏悔。德国前总理维利·勃兰特于1970年春，曾在华沙犹太人起义纪念碑前下跪，为当年的法西斯向犹太人谢罪。德国政府对曾经遭受纳粹苦难迄今尚在人间犹太人，认真给予了赔偿；诚心诚意地建立了‘法西斯罪行展览馆’，以昭后世。……日尔曼人这种认真求实，勇于自责，无私无畏的至大至刚气魄，当今尚无其他国家与民族可望真项背。”

“斯夜，浮想联翩，感慨万千，久久未能成寐。”

我想在此谈几句，青春无价，生命无价，反右派斗争对一代知识分子的摧残迫害，使多少个家庭家破人亡，如我等幸存者，经历了令人发指而不可思议的重重苦难，美好青春二十多年被虚抛，理想和追求付之东流，有谁向我们谢过罪吗？对青春和生命的补偿，就是从物质上也是没有一丁点儿。我们常说“以史为鉴”，我们国家至今所作所为，同日尔曼人“认真求实，勇于自责，无私无畏的至大至刚气魄”，相去奚啻霄壤！艮山兄“浮想联翩，感慨万千，久久未能成寐。”自然是缘于此了。

在《登埃菲尔铁塔》一文的末尾，艮山兄写道：“我还得感谢冥茫上苍的庇佑，使我这条草芥民命幸存下来，并欣逢国泰民安的盛世。我这才有可能在有生之年出境旅欧而亲临巴黎，登上埃菲尔铁塔。这也标志着我的人生登上了原来不可逾越的新制高



点”。我也为兄长的旅欧之行自豪快乐，他理应享受原来亏欠他而未能享受的一切！

《谒开封包公祠》也是一篇游记，这篇游记描述介绍的是我国人民熟悉的铁面无私，秉公执法，敢于和皇帝、皇太后对着干的包拯的祠堂。他是“怀着对包公的崇敬心情，刚到开封立即前往晋谒包公祠。”

游记末段，是这样写的：“步出祠堂，漫步街头，绵绵思绪联翩而至。包公远处千载之前的封建帝制时代，并未受到这个主义，那种学说的启迪教化。但他为人刚正，为官清廉。从而铸就了不畏权贵、不谋私利、疾恶如仇、大义凛然的崇高形象；给后世留下作人、为官的楷模；受到万代景仰。……包公的巍然形象久久盘桓于我的脑海。”

这是点睛之笔！既是对“包公的巍然形象”的热情赞颂，更是对法制的急切呼唤。千年之前的包公为后世留下作人、为官的楷模，受到万代景仰，当今社会仍需要千千万万个“包公”为民作主，却是需要法制建设作为保证的。

艮山兄文集集中的“风雪人生”回忆录部分，均为纪实内容。如《触礁蒙难》、《风雨落英》、《流放岁月》、《牛棚纪事》、《糟糠之妻》、《老人与观音》等等，真实地回顾了他大半生遭遇的苦难，真是声声泪，滴滴血，九死一生！1955年的肃反运动，他这个出身城市贫民，历史清白，原本没任何问题需审查的人，却祸从口出，被一个求功心切的人打了小报告，领导层认为他是大有政治背景，潜伏很深，十分危险的敌特人员。因而内查外调，斗争逼供，折腾一年，最后作出一纸结论，未做任何善后，不了了之。1957年的整风运动开始后，他“已成惊弓之鸟，深惧因言贾罪。”党支部书记朱平山号召大家要“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